



方国的实力不可小觑，他们有着灿烂的青铜文明。当中原统治者步步紧逼的时候，虎方渐渐南迁，来到江西牛头城。

这时，天气骤然变冷，寒风挟着乌云呼啸着，细雨扭着身子乱窜，没有退路的虎方士兵，戴着冰凉的虎头面具，握着闪着寒光的青铜武器，涌向牛头城门口，石块呼啸而过，箭矢凌空乱飞，厮杀声和兵器的碰撞声响彻天地，熊熊的火光映红灰白的天空，终于，牛头城被虎方夺取。商周之际，虎方攻破了三苗东部军事重镇吴城，占领了原属三苗的江西赣鄱平原。西周晚期，三苗方国解体后，虎方完全占领了三苗地域，进入了长沙地区。

春秋中期，渐渐强大的楚国分西、中、东三路南下扩张。西路从洞庭湖西部向虎方渗透，虎方被迫将都邑迁到了黄材一带(包含横市)。《左传·哀公四年》云：“楚人既克夷虎，乃谋北方。”这里的意思是楚国入攻占了夷虎方国后，于是谋划侵占北方，说明虎方方国于哀公四年(前491年)被楚国所灭亡，此时是春秋晚期。从此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地区，代替了越人，成为新的主体，同时，青铜时代结束，铁器时代来临。

无论从商朝中期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，一直到商末周初炭河里方国的形成，西周晚期方国势力的进入，直到楚国铁器时代的到来，长沙都有着灿烂的青铜文明。长沙出土的青铜器，数量最多、分布最为密集，从青铜器本身的规格、等级和艺术价值来看，都是首屈一指的。低调的炭河里，却有着不低调的过往和底蕴，赢得了“中国南部青铜文化中心”的美誉，击破了“青铜文化不过长江”之说，摘掉了湖南地域上“蛮荒之地”的帽子。

看过电影《英雄》的人定会记得这样一幕：当无名见到秦王时，在秦王大殿有着夸张的官殿里，乐师走向了编铙，苍劲而古朴、洪亮而悠长的乐音从铙的上口发出，萦绕在空旷寂莫的官殿和无可奈何的秦王心里。那就是最早的打击乐器——象纹大铜铙，是1983年宁乡黄材月山铺转耳仑一农民种红薯时发现的。它厚实而笨重，主体像两片瓦合拢过来，开口朝上，上宽下窄，下面是圆柱形的甬，也就是铙柄，在铙的顶部有一对大象相对而立，大象鼻子连在一起，似乎是在随乐嬉戏打闹。

三千多年后，铜铙依然可以敲击出完美的音乐，当木槌敲击的乐音与烟雨交融，穿越时空的隧道，是否看到翘袖折腰，轻步曼舞，宽大的袖子拂过铜铙、摆动生风？是否听到恢宏的乐音，拂过浏山的苍翠树林，流向山坡的红薯地，应和着悠悠远去的沩水？

千古史痕虽在，青铜无语难循。烹煮佳肴的鼎，盛放美酒的尊，绕梁余音的铙，以及那无数的青铜碎片，要多大的朝堂才可以容得下？要多深厚的文明才可以承载？虽然历史记忆有些苍白，青铜器的铭文常常无语，然岁月搓成的文脉清晰可辨。

走进黄材盆地，清澈河流与雄伟青山交相辉映，潺潺流水孕育着成群的鱼虾，形成一幅温馨的画卷。傍晚时分，凝望远处，神秘的沩山静默在烟雨里，悠悠的沩水漂浮在田地间，近处的白鹭把身子藏在禾田深处，只伸出头在优雅地张望着，或者，它们静静地立在河道的洲滩上，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。不知道炭河里的先民们是否也如我在傍晚这样凝望？几度东风吹世换，千年往事随潮涌。那些曾经的辉煌，带着梦幻的光影，抛洒在烟雨的迷蒙里，湮没在幽然的尘世间。

肆

一个四羊方尊，震惊了世界；一个人面方鼎，揭开了尘封三千多年的方国面纱……那神奇的造型，神秘的图案与铭文，似在向后人述说着曾经的辉煌！可是，今人已经无从知道，在人面方鼎那张表情生动的“脸”上，是否有一丝无奈与难以言喻的忧伤？在有限的认知里，今人怎样才能解开亘古宁乡青铜器之谜？

在炭河里遗址上游走，偶尔还会有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碎片钻入视野，拾掇起来，让它安静地躺在自己的手掌心，是不是可以触摸到古越人的烟火气？烟雨浸润的土地，或大或小的脚印蜿蜒着，是不是可以重合古长沙人走过的痕迹？远处是黛黑的山林，丝丝袅袅的烟雨笼罩着，山脚下高低错落的楼房也钻入迷蒙的雨雾里，河流蜿蜒在田田间，似乎是青铜器上那些回环往复的纹饰，模糊着又似乎清晰着。

山还是那座沩山，包容历史；水或许流过古今，早已改道。这里曾经是杜甫笔下的“湖南清绝地，万古一长嗟”。也是滴居长沙的贾谊文字里的“卑湿”之地，曾国藩说：“湖南之为邦，北枕大江，南薄五岭，西接黔蜀，群苗所革，盖亦山国荒僻之亚。”唐朝以前，人们对湖南的印象就是边陲蛮荒之地，为何？或洞庭水之阻隔，远离北方统治中心，文明邂逅空间的阻隔而成为“蛮荒”？又或是湖南的先秦史籍资料的缺失记载不甚清晰而致？

楚人进入长沙地区大约是春秋晚期，在这之前，长沙这片区域大致经历了炎舜时期、尧舜禹时期和夏代、商代和西周时期。炎黄时期，蚩尤九黎，涿鹿之战受到重创，撤回江汉平原。尧舜禹时期和夏代，九黎演变成三苗部落，又因多次不服犯乱而被征讨，《淮南子·修务》记载：“舜南征三苗，遂死苍梧。”

商代和西周时期，三苗部落退出长江以南，因为战争南逃的商人或者其他中原人，赶上他们的节奏，进入宁乡黄材盆地，融入到当地一古老而庞大的民族——古越人的一个支系“扬越”人，除了一起创造了完全不同于中原的古越印纹硬陶文化外，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青铜文明。一直到西周晚期，炭河里文明方才突然消失。

考古发现，在炭河里古城外西周墓葬发掘区发现了春秋时期的“越人墓”，长沙“扬越”人在中原地区进入阶级社会前还是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，可是，当商周开始了对“荆蛮”“扬越”的征服，夜风中支起的帐篷里留下了许多武器和生活器皿，熊熊燃烧的炉火前也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，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文化。“扬越”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，到西周后期又有了铜制的工具、兵器、农具，长沙从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，跨越式进入较为先进的“青铜时代”。炭河里古城是在商末周初之际建立的，虽然周边发掘了具有越人风格的墓葬，但长沙不可能又退回到原始的石器时代，所以，当时的越人应该依附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国，那么这个方国是个什么方国？

可能就是虎方国。虎方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形成，以虎为图腾崇拜，青铜器上拥有众多的虎形装饰和纹饰。虎方的记录最早出现在武丁晚期的卜辞里，其中有一条卜辞曰：“举其途虎方，告于大甲，十一月。”这条卜辞大意就是商王武丁要去讨伐一个叫虎方的方国，向先祖大甲等告祭，求得先祖的保佑。鼎盛时期的商王武丁伐虎方国之前还要进行祷告，说明虎

一个四羊方尊，震惊了世界；一个人面方鼎，揭开了尘封三千多年的方国面纱……那神奇



变自己的习俗，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，修城池，筑官殿，建方国。或者黄材出土的“戈”首，桃源出土的皿方彝、方彝及湘乡、津市等地出土的青铜爵等，就是他们南下时候弃埋的青铜器吧？否则，这些青铜器的造型、纹饰与中原同类器物没有太大的差异，不过，青铜尊中把羊头放在尊的四方，青铜鼎四面用人脸造型，还有重量级别的象纹铜铙，都是中原地区没有出现过的，不远万里的艰难运送，殷人从中原带过来青铜器又似乎不可能。

有没有可能是“相”侯，得到周朝“分器”赏赐呢？“相”侯其封国在鄂国(鄂州)之南，周朝为了统治“南国”各个诸侯，实行“分器”，或者赏赐青铜器，或者是铜铙，甚至也有可能是技术精湛的工匠。1976年，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中曾发现3件“析器”，分别为析尊、析觥和析卣。据这件析器上的铭文记载，周昭王巡视南国过程中，曾在行宫接见了一位称为“相”侯的人物，并对他进行了赏赐。“相”侯是否就是“湘”侯，是否就是当时炭河里方国的最高统治者？一切都有可能，又似乎一切都不可能！就像初夏拨不开如烟雨水雾，时而清晰，时而朦胧，谜一般地存在着。

方国的人或许是本地人，或许是中原人，或许是南方人，或许……不过，他们是古代长沙人，也是现代长沙人的先民，他们在长沙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，演绎独一无二的青铜文明。

方尊以羊为图腾，不仅承载了古老的图腾崇拜，蕴含着以铜羊代真羊祭祀的深远寓意，或吉祥和谐，或繁荣兴旺，更是创新地用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整体作为器型的主题装饰，把对生活的热爱镌刻在圆润的线条、巧妙的构思以及惟妙惟肖的造型上，熔铸到青铜斑驳的锈迹里，呈现出灵动的浪漫。这或许就是当时湖湘大地社会的写照，一边是对中原文化的接纳传承，一边又有自己的个性创新。四羊方尊等宁乡青铜器在描摹动物的时候虽然也写实，但是却能抓住瞬间即逝的动态，抓住动物的灵魂，使得图案呈现出唯有楚人才有的如凤凰一样的超拔、浪漫。

通过博物馆幽黄的灯光照射，四羊方尊精美的纹饰渐渐苏醒：脸上的云雷纹缓慢游动，颈部的蕉叶纹流畅清新，腹部的鳞纹细腻层叠，圈足的夔纹直线和弧线交错，长长的身子弓起权威和富贵；又或者那蜷伏在两羊比邻处的龙，低垂着头，擎着两只角，龙身蜿蜒处是羊头的肩颈部延伸出来的龙脊，没有层叠如浪的鳞甲，只有碾碎鳞甲后回旋往复的云雷纹，每一道回旋处似乎均藏着历史的厚重、未解的秘密。不知道昂首的羊碎步跑向四方的时候，那低首的双角龙是否会挣脱青铜的桎梏游走在天地之间？不知道指尖划过龙脊的地方，是否会触碰到裂痕里溢出的美酒，填满纹饰的沟沟坎坎？

当时光洗尽铅华，宁乡青铜器把兼收并蓄的博大气象融进滴滴铜液，把融合创新的精神铸进点点铜绿，把湖南人特有的灵性、浪漫镌刻在器物的灵魂深处，演绎着独属于湖南人的青铜文化，改写了湖南乃至南方的文明……领略了宁乡的青铜文化，谁还敢说湖南是“蛮荒之地”？

能就是这些青铜器的拥有者，只是，这些青铜器到底来自哪里，难道就是方国铸造？问题实在是太烧脑了，谁能说清道明？

《名义考》云：“三苗建国在长沙，而所治则江南荆杨也。”炭河里遗址现场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，是与中原迥然不同风格的越文化，是不是三苗和越人融合在一起？想当年，三苗北上扩张，过千山万壑，硝烟弥散烽火狼烟，枕藉荒野，到处一片荒凉，鏖战沙场，伏尸百万，落荒而逃只得下江南。三苗先民的后裔拾起行囊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溯湘江，逆沩水，和黄材盆地“荆蛮扬越”人一起，休养生息，以青羊为图腾，奏响大铜铙音乐的交响，昭示着三苗演绎的青铜文明在炭河里根深叶茂，郁郁葱葱。

有人说，“成功是成功者的里程碑，失败是失败者的墓志铭”。对于中原地区的历史更迭，自是均有详细记录，可对于一个失败者三苗，连它的墓志铭也是少有人书写，以至于慢慢湮没于历史的长河里。于是就有了很多疑问：炭河里不曾找到大型冶炼作坊的遗址，铸造青铜器的陶制“模”和“范”更是难以寻觅，何况，方圆数百里没有铜矿资源，那些精美的青铜器是怎样诞生的？越人，直到中原进入阶级社会了才摆脱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，三苗是否有经济实力和技术来铸造惊艳世界的青铜器呢？

许是商周朝代更迭时，中原的某一支殷人部落，南下带来了青铜礼器？多少次暮色褪尽和衣而眠追兵又至，多少次曙光来临却抬不动疲瘁的双脚，多少次月亮和星星晃晃着前行的泥泞，多少次摆脱了周王朝的追兵又迎面撞上当地野蛮凶悍的部落，青铜器或者被劫或者弃埋。江南的阴雨绵绵，冰冷的雨点击打在锈色斑斑的青铜器上，击打在那犹如流寇的人们脸上，千辛万苦，万苦千辛，“流寇”们来到了黄材盆地，谁也不曾想到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：富饶的土地上生长着金黄稻穗，幽静的河流滋润着深秀山林……

远离战火纷飞的黄材盆地平静和谐，让“流寇”们欣喜不已，他们改

宁乡青铜器之谜？

1963年5月的一天，沩水的洪水退却后，一村民提篮到河边洗菜，猛抬眼，见不远处的河滩上躺着一个奇怪的东西，走近看，是一个带有花纹的椭圆形金属器物，有盖有足，还有一个提手。村民隐隐觉得这个东西不简单，后来，有人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文博人员，原来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青铜提梁卣，用于盛酒的酒器。

提梁卣的盖子和底部内壁各铸有“癸冉”二字，这可能与商代王室保持密切关系的显赫氏族“冉”族有关。卣内发现玉珠、玉管1100余颗(支)，极有可能是祭祀用的礼玉。文博人员进一步在炭溪河与沩水交汇处、叫作炭河里的台地上进行了发掘，一个鲜为人知的方国遗址即炭河里遗址得以展现。

现保存面积2.3万多平方米的炭河里遗址是西周时期某一方国的都城所在地，不但有官殿遗址、城墙遗址、城壕遗址，还有平民区遗址和西周贵族墓葬。文博人员清理出了七座西周贵族墓葬，出土了具有本地文化特征且器物极为精美的青铜器、玉器、陶器。这些高等级遗存的发现说明炭河里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遗址，而是湘江流域周王朝时期某一中心聚落，或者说是独立于周王朝之外的某个方国都邑。

或许，在历史的兴衰中，地面上的遗迹要么彻底毁灭而烟消云散，要么不断重建而融合新的元素，只有藏在地下，躲到常人难以关注的秘境，才可以历经岁月的侵蚀完整地保存。只是，不知道那些坐北朝南的幽深宫殿里，会留下多少急急的脚步声，是雌鸠鸟的爱情还是历史变故？那些官殿的瓦片上是否生长着点点青苔？如米一样小的白色青苔花是否会慵懒窗前瞻望之人的时光？那飞翘的翼角，直触天际，风吹铃动，扑朔迷离。还有黄土和石头夯实的厚厚城墙，凹凸不平，是否会记住那些曾经抚摸过它的手温？悠悠前行的护城河，接纳着沩山清溪，蓄水为濠，光影流动，流走了幽幽时光……

此时，中原地区正是朝代更迭之际，一场牧野之战，西周遏制了商汤前进的道路；一场熊熊烈火，终结了纣王的暴行，西周成为华夏的主人。然而，在宁乡炭河里，一个方国正悄然兴起，它的存续时间大约是商末周初至西周晚期，遗憾的是，历史上不见任何记载。方国的主人可

叁

青铜是物质的，也是文化的。“於饔酒扫，陈馈八簋”，是洒扫庭院、摆好八盘主食与亲人共享的温情；“帐底晓歌起，军中杀气横”，是沙场点兵、红旗猎猎气势的惊天动地；“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”，是贵族们举酒同欢、鼓乐歌舞宴饮的盛大；“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”，是求而不得、欲罢不能的心动爱情……每一件青铜器的背后不单纯只是一个食器、酒器、水器、兵器等，更是文化的选择和融合，地域特色的凸显和人文精神。

朝代的更迭并非只是战争和杀戮，也是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。中原青铜器有礼器和兵器，而礼器的原始功能不过就是容器，庞大的体积和重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，狰狞凌厉的纹饰增强了庄严和神圣感。一条湘江，北通中原，南达南岭，历来，湖湘既有不同部族和移民的涌入，又有中原地区不断地征讨，进而，以炭河里为代表的南方青铜文明更具有包容性，呈现兼容并蓄的开创明度。

“器以藏礼，物以载道。”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大多体现着炫耀的本质，如后母戊鼎，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，方足厚重而又高大的外形、狰狞凝重而又神秘的纹饰、深重突出而粗犷的刻镂，显示着顽强坚毅的气度、不可抗拒的王权！“鼎”立地上，大地感受到不一样的分量，天地同感万生自！

同是商代晚期，炭河里也有这样厚重的鼎，它就是大禾人面方鼎。方鼎稳重的外形上直立的两耳和柱状的四足，冰冷的锈迹里粗犷而回环往复的纹饰，让人感受到不可摧倒的力量，不可知晓的神秘，感受到来自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。不过，中原鼎的兽面纹在鼎腹，一眼瞥见，震撼感陡然升起。而炭河里鼎的

初夏的烟雨灰白了天空，灰白了大地，灰白了人们的视野，被滋润的绿叶悄悄地铺展，满山弥漫着草木的芬芳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白鹭回来了，有的张开宽大的翅膀，滑开山间的烟雨；有的直立在树上，或隐或现，似树尖开出的白玉兰。宁乡黄材盆地月山铺转耳仑山上，有一群白鹭从容地歇在树上，它们时而扬颈轻啼，时而舒展白羽。

“快快布谷——快快布谷——”一只布谷鸟快速地掠过田野，为这烟雨天气增添了一抹清新的亮色。

云雨停歇之际，17岁的姜景舒叫上弟弟，肩扛锄头，手提一捆青绿的红薯秧向后山转耳仑爬去，在山腰，有一小块平地，是他们家祖传栽种红薯的地方。

锄头挥舞间，泥土翻转。突然，哐啷一声，姜景舒的锄头遭遇重重地击打后被反弹起来，震麻了他的双手。姜景舒以为是挖到了石头，为了不弄坏锄头，他和弟弟一起用手刨开泥土，一个糊着泥巴的方形器皿上口出现了！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兄弟俩终于挖出了这个器皿。大概小腿高，两头是方形的。剥掉泥土，可见腰身上有四个“水牛头”，卷曲着角，其中，两个“水牛头”中间是龙头，鼓着个大眼睛，甚是骇人……

见之，兄弟俩面面相觑！器皿太大，又太沉，为了不引人注目，直到夜幕渐渐拉拢黑沉沉的幕布，兄弟俩才麻着胆子将器皿抬回家里，并用水一遍一遍地冲洗干净。

这是1938年阴历四月的一天，没有电闪雷鸣的渲染，没有诡谲奇异的征兆，一个孤独、厚重而神秘的灵魂就这样被唤醒了！它就是三千多年前商周时期的四羊方尊，是中国博物馆当今的镇馆之宝，也是中学教科书里突出介绍的文物。

不知道三千多年前，当四羊方尊被人们簇拥着抬上转耳仑山坡的时候，山川是否听到了人们的呐喊，是否有白鹭惊飞烟雨的天空？三千多年以来，它一直孤独地在等待，等待着人穿越时空的相见；等待抖落身上的泥土，让自己重回檐牙滴水、亭台楼阁的官殿里……这么重量级的“国宝”为何会出现在转耳仑山坡上？难道四羊方尊只是独立的存在？

一晃21年过去了。

1959年，黄材盆地一位农民上山开荒种地，一锄头下去，清脆的响声后便是手腕的震颤，一个方形四足器物赫然出现，四个面有一张同样的绿森森的“人脸”，带着神秘而诡异的气息，凸鼓的眼珠一直盯着这位农民看，他内心非常害怕，拿着锄头的手不停地颤抖，扔了，又不知道扔哪里，带回家，又怕“这件封建的东西”带来厄运，于是他抡起锄头三下五除二就把它砸碎了。殊不知，他砸碎的是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鼎——大禾人面方鼎！所知发现的商周青铜方鼎中，有四面鹿头纹的，有四面兽纹的，但就是没有四面饰人面纹的。大禾人面方鼎在出土之前不仅从未见过，就是历代金石著录也未曾有记载。大禾人面方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方鼎！

青铜器是什么？是按一定的比例把红铜和铅、锡熔化后，浇铸到陶制的“模”和“范”里而形成的，最早出现在夏朝，当时不过就是人们用来煮饭、喝酒和祭祀的器具，或者用来耪地、挖土用的农具罢了，铜器比石器锋利，比陶器耐用，实用性比较强。商朝时，人们掌握了成套的青铜器铸造技术，在器物上铸有精美的兽面纹；云雷纹等，大多用于宗教祭祀和贵族间的礼仪活动，表现出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。到了鼎盛时期的周朝，青铜器不仅更加多样化，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峰。那些繁缛而精美的纹饰，灵动而诡谲的动物，以及各种象形而非写实的器型和器物内的铭文，折射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，记录着一些重要的历史时刻，形成了独特的青铜文化。

如果青铜器出土于墓葬或者古城遗址，便可以推断其产生在哪个年代，归属者是谁。不过，宁乡青铜器出土的方式很特别，充满着随意性、偶然性，不仅栽种红薯秧、开荒可以拨开历史的尘土，穿越时光的隧道，甚至于洗菜、采药、游泳都能与青铜器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。

盛满了千余件玉器的兽面纹提梁卣，就是黄材一位村民在炭溪河边洗菜时发现的；号称“甗王”的兽面纹巨型甗是4个学生在黄材炭河里附近的沩水里游泳时发现；5个大铜铙是在宁乡师古寨南坡距离山脊10米的地方挖到的，24年后师古寨北坡距离山脊10米的地方，药农追蛇追到一个洞里发现了10个大铜铙……

即便是非科学挖掘，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，宁乡就先后出土了1500多件商周青铜器，其中300多件造型奇异、纹饰精美、铸造工艺精湛，可谓无价之宝，价值连城，因此，宁乡一跃成了“中国南方青铜器之乡”！

青铜时代

李海燕

文脉长沙